

试论近代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原因 ——兼与华人移民东南亚之比较

曹善玉

(中山大学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 大批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表面上看, 政治强制曾是导致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突出原因, 但总体来看, 朝鲜和中国东北分别具有的推力和拉力因素, 亦即经济因素所造成的生存压力和需求, 在朝鲜人大量移居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此外, 铁路的铺设亦恰逢其时地便利了朝鲜人向中国东北地区的流入与散布。本文还尝试将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的原因同近代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现象做一简单的比较, 进而折射其移民模式的特征。

关键词: 朝鲜人移民; 中国东北;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

中图分类号: D73/77 312 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0)03-0062-11

中朝两国为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 边界相接地区较广, 在相当长时期内, 朝鲜人与汉人曾杂居在两国边界, 互相往来。但移民的出现, 则是19世纪后半期之后的现象。特别是同治十年(1871年)后, 清政府对内废除了对东北的长期的封禁政策, 对外又与朝鲜签订了《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奉天与朝鲜边民贸易章程》与《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等, 便有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到中国东北地区垦荒种地, 而清朝亦对于迁入到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朝鲜移民实行“恩威兼施”的怀柔与同化政策。20世纪上半叶, 朝鲜移民更是大规模进入中国东北, 并逐渐成为今日朝鲜族的前身。对于这一现象及其原因, 曾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①, 但对于大规模移民出现原因的解释似乎尚不够全面。本文利用中、日、韩英文的原始资料, 尝试对近代朝鲜人大量移居中国东北的原因再做探讨。讨论这一问题不仅可以从多角度考察当时东北亚区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经济状况, 也有助于我们从比较分析的视野思考近代华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的历史进程和特征。

收稿日期: 2010-07-27

作者简介: 曹善玉, 女, 朝鲜族, 吉林人,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①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 朴昌昱:《试论朝鲜族迁入及其历史上限问题》, 载韩俊光主编:《朝鲜族迁入史资料汇集》, 延吉: 延边历史研究所, 1988年; 权立:《中国朝鲜族史研究》,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韩俊光:《朝鲜族》,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6年版; 郑信哲:《朝鲜族人口流动及其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内部研究报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98年版; [韩]李承律:《东北亚时代的朝鲜族》,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年版; 黄有福:《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研究》, 载黄有福主编:《中国朝鲜族史研究 2008》,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年版。

一、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过程及主要政治因素

关于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过程,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Edward Taehan Chang教授将移民过程分为 5 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 1910 年以前,这时期移入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约有 26 万人,主要是经济原因;第二阶段是 1910 至 1920 年,这时期的朝鲜人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朝鲜而移居东北,约有 40 万人,其中 1919 年“三一”运动后进入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就达 7 万人;第三阶段是 1920 至 1930 年,进入 1920 年代以后,受到日本国内所提供的就业劳动的诱因,很多朝鲜人拥向日本,而移居中国东北的人数相对减少,这时期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口增长率只达到 3%;第四阶段是 1930 至 1940 年,这时期朝鲜人移民迅速增长,到二战爆发前夕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多达 100 万人以上,但是这种增长率进入 40 年代以后几乎停止;第五阶段是 1940 至 1950 年。^[1]从以上观点不难得出,20 世纪上半叶,推动朝鲜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原因虽有经济方面的,但更突出的还是与政治条件密切相关,特别是日本对朝鲜与中国东北的殖民政策促进了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郑信哲教授认为朝鲜人移居中国的过程可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 世纪 60 年代至 1910 年。1860 年以后朝鲜半岛北部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穷困潦倒的朝鲜农民冒死越江到中国东北开荒,这时期在中国清政府的开禁政策的推动下,朝鲜农民大量迁入中国。第二阶段为 1910 年《日韩合并》条约之后至 1931 年“9·18”事变以前。除破产的农民继续移入中国东北外,1910 年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1911 年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促使朝鲜民族志士移居中国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第三阶段为 1931 年“9·18”事变以后至 1945 年二战结束为止。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制移民,即“日人治韩,朝鲜人治中国东北”的思想下强制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2]笔者同意以上 3 个阶段的移居过程的分析,不过,笔者认为,第三阶段中除日本政策下的强制移民外,仍有大量的朝鲜移民为了生存而自发地移入中国。朝鲜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历史,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到 20 世纪 10 年代至 30 年代达到顶峰,如果利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加以考察,便可以窥见政治之外的诸种原因。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统计学家莱文斯坦 (E. G. Ravenstein) 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的迁移并非完全盲目无序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一是居住地存在着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二是迁入地存在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即决定人口迁移行为的因素是原住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移出地的推力因素,一般是指迁移者对目前居住地的各种不满意因素,如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等。这些不利因素迫使人们离家出走,形成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外向推力。^①移入地的拉力因素,是指移入地各种可能满足迁移者某种意愿并最终导致其定居的因素,如较高的经济收入、较多的就业机会、优越的居住条件、更好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等等,产生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引力。近代朝鲜移民进入中国东北,除政治上的强制原因外,同样亦有所谓“推-拉力”方面的因素,如生存环境、移民政策等,另外亦与交通手段的更新有关。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二、移出地的推力因素

从移出地的情况来看,移民的主要原因有自然灾害、政治迫害、经济不安定以及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兴起的抗日独立运动等。19 世纪 60 年代,朝鲜北部连年发生了水灾、旱灾与虫灾等自然灾害。咸丰十年 (1860 年) 8 月,朝鲜西北地区发生水灾,富宁等 10 个邑均受其害,1 225 户民家淹

①. 该观点见于莱文斯坦在 1889 年发表的题为《人口迁移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的著名论文,转引自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 1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 页。

没。茂山、钟城等邑受灾尤重,作物严重歉收。同治八年(1869年),咸镜北道六镇遭受水灾,田地几乎颗粒无收,农民们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造成饿殍遍地、哀鸿遍野的惨象。^[3]于是朝鲜贫民置李朝政府的锁国政策于不顾,不断地集体渡江来到我国东北地区定居。清朝方面的史料也记载:

同治九年,朝鲜大雨雹,国内饥荒,饿莩载道,韩民遂不惜冒犯重禁,渡江越境,卖妻鬻子,乞食求生。^[4]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实行公开掠夺政策。朝鲜统监府继续实行朝鲜农村中现有的半农奴制生产关系,并扶植地主剥削农民,掠夺其土地。1910年8月23日,即日本吞并朝鲜的第二天,朝鲜总督府颁布实施《土地调查法》开始对朝鲜各地的土地进行所谓的调查。^①土地调查的结果,使许多朝鲜农民丧失土地,特别是原有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或佃农兼自耕农走向没落,沦为佃农。根据日本总督府的材料,从1915年到1919年,朝鲜农村中3类主要的土地所有者的数量出现了如下变化。

表 1 朝鲜农家户数的变化表^[5]

年次	农家户数(户)				
	地主	自耕农	半佃农	佃农	总计
1915	39 045	570 380	1 073 838	945 398	2 628 661
1919	90 376	525 830	1 045 606	1 003 003	2 664 815

这些数字表明,地主的户数增加了1倍,而大批农民则丧失了土地。地主和佃农数字的增加表明自耕农和半佃农的减少,出租土地面积也相应地增大了。这些土地主要是集中在地主手里。例如,在从1910年到1920年期间,出租土地的面积增加了42%。同时,朝鲜农村中也发生农业经济的分散化。例如,1910年平均每户耕地面积是1.63町步(1町步约等于15亩),而1920年已经缩小到1.42町步了。^[6]

朝鲜地主户数增加的另一面就是地主的地产被割碎,取而代之的是日本人成为朝鲜的大地主,朝鲜总督府成为朝鲜最大的土地所有者。^[7]日本政府又扶植日本企业家展开广泛的土地投机活动,即利用朝鲜农民的穷困,用低价收买他们的土地,然后以更高的价格转让,或者以很高的租额佃给破产的农民。因此,朝鲜农民的处境每况愈下,不得不另寻出路。

实际上,关于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拓务省曾派员对东北的朝鲜人进行过调查,如表2。

从以上201人的回答中有30人(占14.9%)认为因本国经济困难不得不向中国东北移民。33人(16.4%)因为贫困;72人(35.8%)因为生活困难所以移居中国东北。从统计来看,朝鲜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占67.1%,而政治原因只占7%。^[8]其实,日韩合并后,谋求

①.《土地调查令》的实施时间为1910年至1918年底,以确立近代土地所有制为由,实施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价格、地形及地目(土地种类的名称)的调查。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私有权被视而不见,租地权等耕农所拥有的部分所有权被无偿地排挤于土地所有权之外。官田、屯田、牧场等均变为总督府所有的土地,农民土地也被编入总督府的所有地内。只有村落或氏族的共有地,才由于实力人士的申报成为私有地。参照[韩]姜万吉:《韩国现代史》,陈文寿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107页。

独立运动的朝鲜人也进入中国东北进行抗日运动。尤其是 1919年,朝鲜国内爆发三一运动后,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运动达到高潮,但随即遭到朝鲜总督府残酷的镇压与迫害,造成了朝鲜半岛大批破产农民和反日志士与难民纷纷迁徙流入中国东北地区。据不完全统计,自 1910年到 1920年迁入鸭绿江以北的朝鲜人口有 98 657人。^[9]

表 2 移居东北的朝鲜人的动机及理由一览表^[5]

原因及理由	绝对数 (人)	相对数 (%)
因本国经济困难所导致的困难	30	14.9
为家里挣钱	33	16.4
生活困难	72	35.8
衣食困难	2	1.0
在本国的事业失败	24	12.0
旅游的结果	2	1.0
本国的政治理由	7	3.4
为了农业经营	18	9.0
为了中国东北的金矿	11	5.5
为了事业的成功	1	0.5
跟随亲戚	1	0.5
总 计	201	100.0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拓务大臣官房文书课编《满洲与朝鲜人》(1933年)中的内容编制。

三、移入地的拉力因素

中国东北土地之广大、人口之稀少、物产之丰富,早已是举世闻名的事实。日本人称它为东亚的宝库,欧美人则称它为亚洲的新大陆。^[10]从战略防御角度来看,清政府方面“因俄人有与朝鲜陆路通商之议”,为了加强边防,“安抚韩民,不使生心外向”,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珲春设置越垦局,并划图们江以北长约七百里、宽约四五十里的地方为收纳朝鲜移民的“专垦之区”。^[11]并且对于迁入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朝鲜人实行了“恩威兼施”的怀柔与同化政策,并没有对越垦朝鲜人驱逐或刷还。倘若清政府将其全部驱逐出境,就会使已经开垦出来的良田废为荒地,方兴未艾的“移民实边政策”也将随之半途而废。如果朝鲜政府将其悉数刷还,亦无法安插并予以生活上的保障。正如朝鲜政府勘界使李重夏所称:

越垦流民众多,欲一一刷还,则无寸土可以安插。欲收入于上国版图,则恐强邻援以为例。若一听吉林之驱逐,则其民必尽入俄地,所以屡年招抚,无计可安。^[12]

基于上述原因,中朝两国对越界朝鲜垦民采取放任的态度,并致力于“安抚”工作,以“慰流氓归附之心”。^[13]这也为朝鲜人移居东北提供了主观上的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清朝政策对兴京以东,伊通州以南,图们江以北之地,实行封禁。因此,这些地区留有大量的未垦之可耕地。虽然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积极推行移民实边和招垦政策,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招来大量移民,而东北地域广阔,仍有大量的未开垦之可耕地。到 1929年,辽宁

的未耕地面积占可耕地面积的 30%; 吉林占 55%; 黑龙江占 70%。^[14]而且, 汉人移民大多从事旱田耕作或涌入城市, 他们并不善于水稻的耕种, 而朝鲜移民具有丰富的水稻耕种经验, 因此, 东北的水稻生产仍由大量的朝鲜移民来从事。

在土地所有权方面, 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对归化入籍的朝鲜人垦民予以土地所有权, 因此, 对于失去土地的朝鲜农民来说是极大的诱惑。而且, 不善于种植水稻的汉人地主积极雇用朝鲜人农民从事水田生产, 当时有人曾讲:

汉人地主要利用韩农善于种水稻的能力 (中国移住东北的农人, 大部分是不惯于种植水稻的山东、河北人), 一面因为日本不惜千方百计地给移居东北的韩农以绝大的援助, 所以结果还是东北所有的水田经营, 已有十分之七八据在韩农手里。^[15]

不堪贫穷与日帝统治的朝鲜人千辛万苦移居中国东北, 仅仅是 1920 年, 移入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就多达 75 000 人, 散居在中国东北各地的朝鲜人达 50 万人。^[16]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通常选择在冬季, 其理由与作物生长期有关, 夏至秋季可以朝耕夕归, 在本国内勉强维持生计, 到晚秋时节将变卖他们所有财产, 作为路费经铁道或坐汽船到达中国东北, 他们到达中国东北时, 十之八九是空手。严冬时节, 他们寄宿在较早进入中国东北的老乡家里。作为代价, 次年要在其农场里免费干活; 或者与地主签下契约, 从汉人地主那里获得食品与住所。此种类型, 通常是朝鲜人地主或汉人地主向韩国移民贷出土地, 韩国移民成为佃农。朝鲜人佃农因经济上的受制, 对地主唯命是从。

四、铁路与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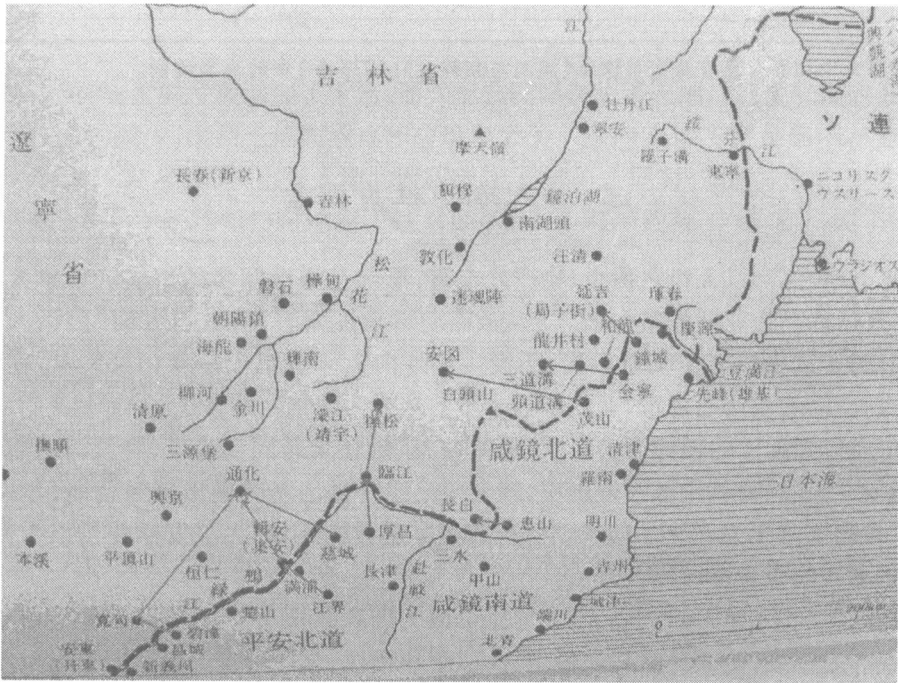


图 1 中朝边境的韩人进入中国之路线图

除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外, 交通手段的不断改进, 尤其是铁路的修建, 为更多的朝鲜人移居东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管理学大师德鲁克 (Peter Drucker) 指出, 蒸汽机的发明和铁路的建造是

工业革命中的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因素,它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模式,而且,“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了流动性。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得到扩展”。^[17]

在中朝之间未开通铁路之前,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只限于两国边界地区。平安北道的朝鲜人徒步经过宁边、云山、楚山,进入对岸外岔沟,抵达中国新兵堡东西甸子和通化等地;还可以从新义州出发,从沿江边的老兔滩进入对岸的大荒沟,再进入内陆地区;还有最近的一条路,是经过安东(现为丹东市)进入中国怀仁(现为桓仁县)等地区。咸镜南道的朝鲜人则经过长津、新加乙博镇等地,到达厚州古邑茂昌里、富山洞梨坪里,再从这里迁入到对岸附近及北方汤河地区。咸镜北道的朝鲜人从钟城、会宁、茂山等地越过图们江进入延吉、龙井、安图等地(参看图 1)。^[18]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从北到南,朝鲜移民进入到与原居住地相对应的中国地区:钟城——局子街(现为延吉市);会宁——三道沟;茂山——安图;惠山——长白;厚昌——临江——抚松;慈城——通化;江界——辑安;碧潼——宽甸。而到 20 世纪初,铁路的铺设推动了朝鲜移民进入东北内陆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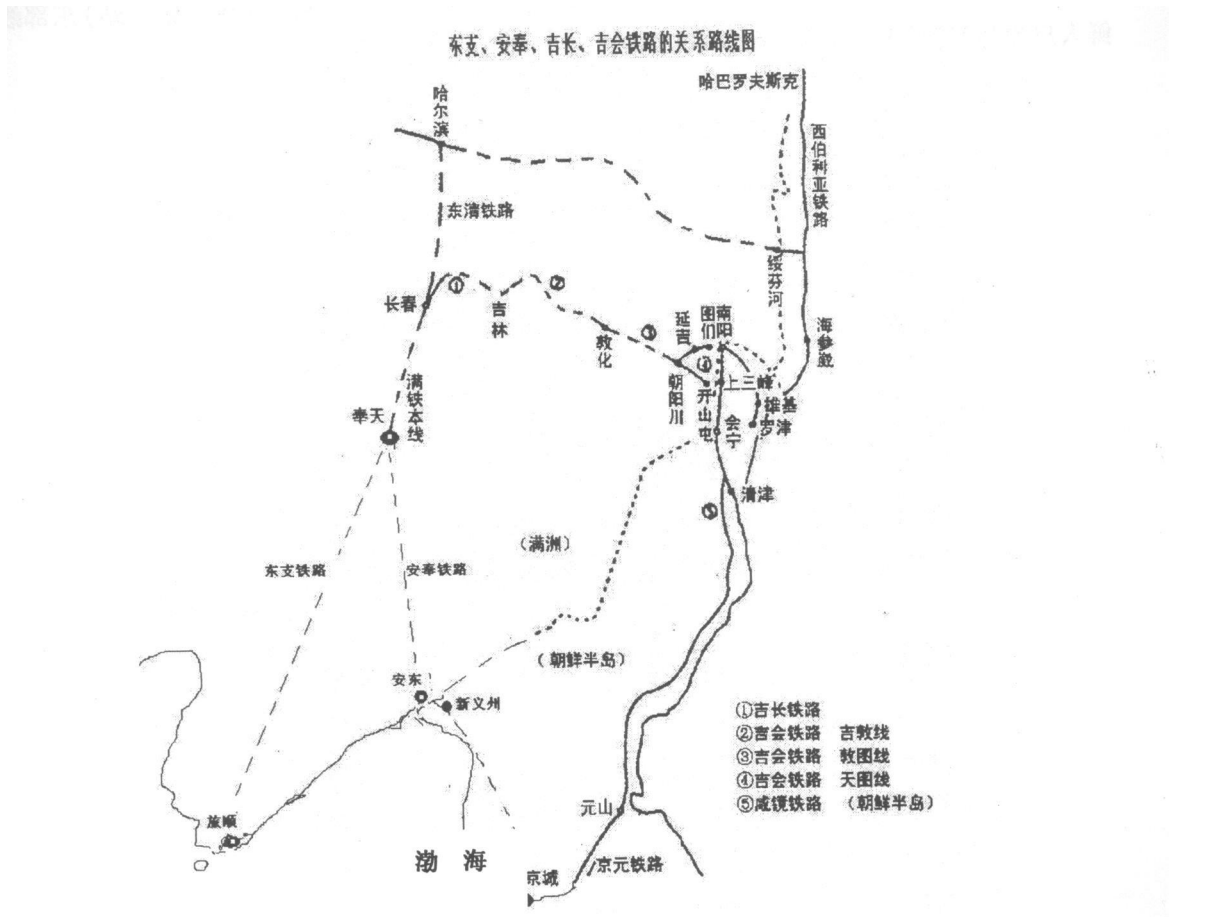


图 2 中朝铁路分布图①

①. 该图是笔者依据《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王胜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53 页图 7-4 修改制成。王图则引自《铁道网的形成与现代史》([日]井上勇一, 中公新书, 1990 年)第 157 页。

安东 - 奉天铁路是日俄战争中日本擅自修建的临时军用轻便铁路,它既未经清政府的允许,也不是战后由俄国手中继承的转让权益,日俄战争结束后本应该立即拆除,但是日本并未拆除,反而强制改长,至 1911 年 11 月 1 日安奉全线开通,线路总长 261.68 公里。该路有大小桥梁 205 座,最长的太子河铁桥长 544 公尺。铁路占地 2 058.6 公顷。满铁在改筑安奉路的同时,强迫清政府签订在鸭绿江架设铁桥的协定。在鸭绿江建造了铁桥,使安 - 奉铁路与朝鲜京城 - 义州铁路接轨^[19],朝鲜人便可以直接从朝鲜乘车进入奉天。1906 年在东京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中国东北着手其经营方针,即经营铁路、开发煤矿、移民、兴办畜牧农业设备。完成了经朝鲜咸镜北道的会宁至东北吉林的铁路的铺设与连接,使朝鲜内地的朝鲜人经会宁 - 吉林、汉城 - 安东路线进入东北。东北内陆地区的铁路也相继完成。至 1931 年前,东北地区还先后修筑了新奉(新民 - 奉天)、奉海(奉天 - 海龙)、吉敦(吉林 - 敦化)、吉海(吉林 - 海龙)等铁路线路,累计长达 6 000 余里(参考图 2)。^[20]

进入到中国境内的朝鲜人通过铁路不断地向东北内陆地区分散。例如,据日本拓务大臣官房文书课的调查,1930 年 1 月至 8 月,仅 7 个月通过东支铁道(旅顺站到吉林宽城子站)东部线的朝鲜人户数为 1 261 户,人口达 6 124 人(参看表 3)。^[21]

表 3 通过东支铁道东部线的朝鲜人移住者统计表(1930 年 1—8 月)

目的地	户口数(户)	男(人)	女(人)	总计(人)
哈尔滨	386	837	818	1 655
三姓	5	16	20	36
宁古塔	100	320	345	565
双城堡	4	5	1	6
蔡农沟	4	11	9	20
三岔河	2	3	3	6
陶赖昭	21	49	38	87
阿西河	12	21	11	32
二层甸子	30	102	68	170
小林子	16	43	30	73
帽儿山	50	207	105	312
蜜蜂站	15	42	24	66
二道河子	65	230	115	345
小舟站	50	80	40	120
乌吉密	30	75	45	120
乌吉密河	75	260	130	390
一面坡	52	116	134	250
朱子营	22	43	26	69
韦沙河	26	16	14	30
亚库尼	20	48	30	78

目的地	户口数(户)	男(人)	女(人)	总计(人)
石头河子	15	15	28	103
横头河子	7	17	23	40
山石	58	175	102	277
默林	53	201	152	353
磨刀石	—	130	70	200
牡丹河	3	7	6	13
七河	35	96	32	128
穆棱	12	30	30	60
马桥河	28	62	48	110
小绥芬河	50	140	102	242
八道河子	14	45	42	87
绥芬河	21	44	37	81
总 计	1 261	3 546	2 578	6 124

资料来源:该表是笔者根据日本拓务大臣官房文书课:《满洲与朝鲜人》(拓务调查资料第三编)(1933年)的内容编制。

五、与华人移民东南亚的比较

本文的个案还可以被置于比较分析的架构下加以思考。我们知道,1840年至 1940年间,中国人(尤其是闽粤)大规模移民东南亚,已有许多相关的深入研究。如果将同一历史时期的华人移民东南亚与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原因做一初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异同,并进而折射出区域关系和移民网络的不同模式。

表 4 南洋迁民离国的主因^[23]

	类别	家数	百分数
1	经济压迫	633	69.95
2	南洋的关系	176	19.45
3	天灾	31	3.43
4	企图事业的发展	26	2.87
5	行为不检	17	1.88
6	地面的不靖	7	0.77
7	家庭不睦	7	0.77
8	其他	8	0.88
	总计	905	100.00

首先,从推力来讲,闽粤人移居东南亚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因素所致。据陈达 20世纪 30年代

的调查,表明因生计困难而侨居海外的,占华侨总人数的 70%,因南洋有亲戚而去投身的占华侨总人数的 20%;因天灾而去的占华侨总人数的 3%,因其他原因而去者占华侨总人数的 7% (见表 4)。^[22]

庄国土教授指出,鸦片战争后闽粤两省沿海地区人多地少,是造成移民海外的最根本原因。加上这时期闽粤两省小农经济大量破产,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开发激起的劳动力需求刺激下,形成了中国海外移民的最高潮。^[24]这与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有颇多相似之处。不过,由于闽粤社会具有强大的地缘和血缘的凝聚力以及华人移民东南亚的悠久历史,家庭和社会网络的因素成为华人移民东南亚的第二位原因(占 20%),这与朝鲜人移民中家庭因素只占 0.5% 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因为如此,如同孔飞力教授所指出的,华人移民输出地与输入地社会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走廊”——“这条走廊是一个文化的空间,双向地传输着人员、金钱和信息”。^[25]

其次,从移入地的拉力角度看,华人移民东南亚的主要背景是西方殖民者在当地开矿设厂和商业的扩展,从而导致对劳工和商人的大量需求。而殖民政府的政策通常不允许华人移民拥有或耕种土地,这也进一步导致华侨社会中的以华工和华商为主的社会模式。正如王赓武教授指出:“华人到东南亚殖民地是为寻求财富,‘经商和开店是唯一开放给他们的财富之源。所以从广义上说,海外华人社会只分为两种人——商人和热切成为商人的人’”。^[26]与东南亚华侨华人不同的是,东北的朝鲜人大多数为农民,而且绝大多数为贫民。1920年,越过图们江和新兴坪进入到图们江北岸地区的朝鲜垦民有 3 048 户,他们手中的资金全部加起来是 386 356 日元^[27],平均每户只有 126 日元,相当于米 3-4 石而已。^[28]他们除擅长种水稻外,并不具备任何技术,因此也只能从事农业生产。自清朝末期对东北开禁以来,朝鲜人便在东北试种水稻,并不断发展水稻的生产。李勋求于 1930 年对奉天省的 201 户朝鲜人的职业进行过调查,发现 173 户从事农业生产,19 户从事商业,4 户从事工业,1 户为制粉业,有 4 户没有回答。^[29]也就是说从事农业生产的朝鲜人占 86%;从事商业的朝鲜人占 9.5%;其他占 4.5%。杨昭全教授也指出,9.18 事变以前,东北的朝鲜农民人口占移民总人口的 90%;9.18 事变后,其农业人口比例也仍在 60-80% 左右。^[30]

最后,从移民模式来看,除了部分大陆东南亚国家外,近代华侨移民南洋主要是靠海路,而朝鲜人主要是通过边境地区进入中国东北。华商网络也主要是通过东南亚的港口为聚散地,进而同祖籍地(国)以及内陆东南亚建立社会与经济联系的模式,从而构成了滨下武志教授所强调的海洋亚洲的主体部分。滨下教授指出,在海洋亚洲体系中陆地是海洋的一部分,海洋也是陆地的一部分。海洋是陆地通向外界的道路,是陆地和外界相互交流的基础,它是一张流动的网络,而不是一种屏障。^[31]东南亚华侨华人则利用海洋世界所包含的沿海地区、跨海之间,以及诸如连接中国南海与东海的海洋链之间的贸易散居开来。随着这些贸易的往来便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区域^[32],东南亚华侨华人也遍布到整个东南亚地区。这与朝鲜人通过铁路交通、受政治因素制约、以陆地移动和土地耕种的移民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东北的朝鲜移民聚居在汉人并未进入的偏远地区,尤以延吉、和龙、汪清、珲春 4 县为最明显。光绪八年(1882 年),清政府将该地区划为朝鲜人的“专垦区”之后,朝鲜人利用两国边界相临之便利源源不断地移居,并成为当地的主要民族。1930 年,东北的朝鲜人口为 607 119 人,其中该地区朝鲜人口为 395 874 人,占全东北朝鲜人口的 65% 以上。^[33]另外,朝鲜移民还分布在铁路沿线和有河流之平原地区,并形成聚居村落,以便共同协力从事农业生产。

结 语

综上所述,自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

过程,其中尤以 20 世纪上半叶最具规模。表面上看,政治强制曾是导致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突出原因,但总体来看,朝鲜和中国东北分别具有的推力和拉力因素,亦即经济因素造成的生存压力 and 需求,在朝鲜人大量移居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另外,铁路的铺设亦恰逢其时地便利了朝鲜人向中国东北地区的流入与散布。因此也可以说,近代朝鲜人大量移居中国东北,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这些因素中既呈现出近代东北亚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亦反映出这一区域间特殊的经济社会状况。

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的历史与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有内在动力,又有外部作用,并通过铁路的中介而迅速发展。本文所讨论的比较视野仅是初步的尝试。笔者认为,这种横向的跨民族移民比较研究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注释:

- [1] Edward Taehan Chang 《移住中国东北(满洲)的朝鲜人 1869- 1945——抵抗日本殖民地支配》,载高全惠星主编:《散居朝鲜人——以北美、东亚、中亚为中心》,东京:新干线有限会社出版,2007年,第 323 页。
- [2] 郑信哲:《朝鲜族人口流动及其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内部研究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98 年。
- [3] 《日省录》1860 年 9 月 10 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db.history.go.kr>
- [4] 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1908 年,载李澍田主编:《光绪丁未延吉边务报告 延吉厅领土问题之解决》,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 60 页。
- [5][6][7][朝]李清源:《朝鲜近代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 年,第 165、165、161 页。
- [8] 日本拓务大臣官房文书课:《满洲与朝鲜人》(拓务调查资料第三编),1933 年,第 105 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藏,索取号 K26-46。
- [9] 朝鲜族简史编写组:《朝鲜族简史》,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2 页。
- [10][15] 姜君辰:《东北农村经济鸟瞰》(1932 年 7 月),载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 3 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年,第 117、122 页。
- [11][13] 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载李澍田主编:《延吉边务报告 延吉厅领土问题之解决》,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 65、378 页。
- [12] 刘建封:《长白山江岗志略》,载李澍田主编:《长白山征集录 长白山江岗志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第 378 页。
- [14] 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载何廉主编:《经济统计季刊》第 1 卷第 2 期,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932 年。
- [16] 《根据长老教外国传道局报告书》,载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http://db.history.go.kr>
- [17] Peter Drucker “Beyond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The Atlantic Online, October 1999, <http://www.theatlantic.com/past/docs/issues/99oct/9910drucker.htm>.
- [18] 《关于越境鲜人之件》,1912 年,载日本亚细亚历史资料中心, www.jacar.go.jp
- [19] 松本丰三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三十年略史》,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7 年,第 72 页。
- [20]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史资料》(第二卷),1933 年,第 19 页,转引自王胜今:《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54 页。
- [21] 日本拓务大臣官房文书课:《满洲与朝鲜人》(拓务调查资料第三编),1933 年,第 118 页。
- [22][23]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年,第 48、48 页。
- [24]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32-133 页。
- [25][美] 孔飞力:《论华人出国史研究》,龚咏梅译,《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10 页。
- [26] Wang Gungwu, “Traditional Leadership in a New Nation The Chines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in Gehan Wijewardene, ed.,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A Symposium*,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pp. 208

222 转引自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27] [韩] 洪鍾泌:《“满洲”吉林地方朝鲜人移民的经济状况研究》,载《白山学报》第39号,第73页。

[28] 朝鲜总督府:《朝鲜总督府统计年报》第三编,1923年,第60-61页,载日本亚细亚历史资料中心, [www. jacar go kr](http://www.jacar.go.kr)

[29] [韩] 李勋求:《满洲和朝鲜人》,首尔:汉阳大学白南学术馆所藏,1932年,第122页。

[30] 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317页。

[31][32] 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3、105页。

[33] 《在满朝鲜人概况》,第107页,载日本亚细亚历史资料中心, www. jacar go je

[责任编辑:乔云]

**An Analysis of Reasons of Korean Immigrants to Northeast China during Modern Era
In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Migrants to Southeast Asia**

CAO Shan-yu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Abstract Large numbers of Korean immigrants began to settle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860s to 1940s. Seemingly, political turmoil was the prominent cause of the migration phenomenon. However, this paper focuses respectively on the push-and-pull factors in Korea and China, aiming to analyze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Korean migration. Economic factor which derived from the pressure and demand for survival was the major reason of the mass migration. Besides, the timely construction of railway network accelerated the influx and dissemination of Korean immigrants within northeast region of China. The causations of the Korean migration to Northeast China are discuss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hinese diaspora moving to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modern era, in an initial attempt t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ion patterns.

Key words Korean immigrants, Northeast China, Chinese Diaspora, Southeast Asia